

# 中山思想今何在？

盧曉衡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孫中山先生是最為海峽兩岸共同接受的中國偉大的政治家。海峽兩岸對他和他的思想評價都很多，但在認識上有著原則分歧。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兩岸都高舉孫中山思想的旗幟，都希望進行兩岸學術交流，使孫中山思想研究成為兩岸學術交流的突破點和推動力，從而促進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當時，儘管對孫中山思想認知上有重大的原則分歧，由於共同認同中國，雙方還是妥協讓步，從而使交流順利進行。

進入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孫中山研究方面的兩岸交流數量大為縮減，直接原因是臺灣島內以孫中山思想和三民主義命名的研究機構紛紛改名而所剩無幾，研究孫中山思想的多數學者也相應改行，孫中山思想研究在臺灣再也不是“顯學”。更重要的原因是：以李登輝為首的臺灣當局背離了孫中山思想。

本文試從回顧在這一領域的兩岸學術交流從起步發展到縮減的過程，分析其政治背景和原因。

## 一、孫中山思想研究是兩岸學術交流的突破點和推動力

1982年4月2日，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在芝加哥召開第二十四屆年會，並舉行了“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建立一一七十年後的回顧國際討論會”，後者引起了海峽兩岸和海內外新聞媒體和有關人士的高度關注，因為出席會議有來自大陸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後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繩先生和來自臺灣的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來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秦孝儀先生，以及他們所率領的一些資深學者。這是海峽兩岸首次業經雙方最高領導同意，同時派遣學者參加由雙方預先安排好的學術研討會，是啟動兩岸學術交流的里程碑。

1992年6月9日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的“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中國現代化學術座談會”，則是海峽兩岸首次在大陸聯合舉辦的學術會議，主辦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和臺灣孫文學術思想研究交流基金會。

在北京香山會議之前，1992年5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張海鵬研究員等2人，應臺灣政治大學的邀請，赴臺灣出席由該校在臺北召開的“黃興與近代中國研討會”，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首次應邀赴臺灣進行學術，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臺灣的學術交流從單向轉為雙向的開端。

這三個“首次”都是參加以孫中山思想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也許是巧合，但這一事實可以證明孫中山思想研究是海峽兩岸學術交流，起碼是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兩岸學術交流的突破點和推動力。

在香山會議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有關研究所和院學術交流委員會又和臺灣學術機構聯合在大陸舉辦了一些以孫中山思想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如1994年1月在杭州舉行的“海峽兩岸孫逸仙思想與儒家人文精神研討會”，1995年2月在武漢舉辦的“海峽兩岸孫逸仙思想與倫理社會重構研討會”和1996年12月在昆明舉行的“海峽兩岸孫逸仙思想與民族文化研討會”等等。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臺灣社科界學者和有關人士之間的學術交流也很快熱絡起來。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每年約有一百位左右的社科院學者應邀赴臺灣進行學術訪問，臺灣有二百到三百位學者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交流的形式有邀請講學，出席或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合作研究等等，涉及的學術領域較寬，幾乎涉及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但孫中山研究還是其中往來較多的重要領域。

## 二、「偉大的革命先行者」與「國父」的原則分歧在學術交流中的碰撞和雙方的妥協處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風嚴謹，舉辦所有的學術討論會都要求與會學者提前一個月以上時間將論文寄送到該所審核，印刷和安排發言順序，籌辦北京香山會議也不例外，並且與臺灣的主持人員事先就商定妥了的。但是，不知什麼原因，臺灣的主持人一直沒有履行承諾，幾經催索而未果，直到離會議開始前3天(6月6日)，臺灣方面主持人與先行人員才攜帶大部分論文到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領導隨即閱看臺灣學者的論文發現，半數論文不切題，多為介紹臺灣經濟或其他方面的發展經驗，儘管也講了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但宣導臺灣經驗的意圖明顯，還有些文章評論現行兩岸關係和批評大陸現行基本政策，用詞很不禮貌。於是該所領導緊急約見臺灣方面的會議主持人進行溝通和磋商，在臺灣學者論文是否切題的問題上討論了很長時間，從晚上八時直到深夜一時四十分，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人員才開始聽懂和理解，所謂臺灣學者論文是否符合會議主題之爭，實際上反映了兩岸對孫中山思想認知上的原則分歧。

大陸認為，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生者”，肯定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的滿清政府和建立了中華民國的歷史功績，但認為從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中華民國”在法理上就不存在了。

而臺灣方面肯定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至今仍然稱他為“國父”，是認為“中華民國”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後，繼續存在著。臺灣學者在提交會議的論文中講述臺灣現狀，是因為“國父思想至今仍然指導著臺灣的一切。”

兩岸學者對孫中山思想認知上的分歧反映了兩岸當局立場上的原則分歧，客觀地講，雙方都不會因為聯合舉辦這次會議而在立場上做出讓步。然而，雙方都有如期召開會議的良好的願望，還存在著對孫中山思想認識上的一致方面，於是，經過艱辛的磋商，最後各自做出了重大讓步，使這次會議如期召開，會上呈現較為寬鬆和平靜的氣氛，還洋溢著一種同為中國人的情誼，取得了較為圓滿的結果，也為以類似會議取得了經驗。

會議的成功體現了兩岸學者和主持人的求同存異精神，準確地講是“存大異而求大同”的精神；也體現了雙方的智慧和務實精神。更重要的是，雙方對中國的共同認同，也就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並按照“一中各表”的原則精神處理會議的有關具體事務。

### 三、要將「孫中山思想擅揚到中國」大陸到孫中山研究在臺灣的衰退

頗有意思的是，1991 年 8 月，以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身份到北京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商談籌辦會議的肖行易先生，沒有出席 1992 年 6 月在北京召開的香山會議，卻以國民黨“大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身份，於會議前夕給台方主持人發來“預祝一行順利成功，孫逸仙思想擅揚於中國”的傳真。應該說，這份傳真對臺灣會務人員在北京的讓步和努力，是一種肯定和鼓勵，為會議的成功召開做出了貢獻。但是通過會議要將“孫逸仙思想擅揚於中國”大陸，則完全符合當時臺灣的當局“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策思路。

其實，當時的臺灣方面並不瞭解孫中山在大陸的影響和地位。1949 後，在天安門廣場，每逢十月一日國慶日，總有孫中山的巨幅畫像樹立正中，甚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天安門廣場兩邊不再樹立馬、恩、列、斯畫像，孫中山畫像仍安然不動。中國共產黨、國務院和全國政協在多種政治場合，都大規模地紀念孫中山和辛亥革命。所有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都要正面講述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從來都是受到鼓勵的“顯學”而長盛不衰。評價孫中山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內含在從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和取代了“中華民國”的歷史事實。

對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在 1949 年後的臺灣非常盛行，有關研究機構和研究成果都很多。但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起，在臺灣以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命名的研究機構紛紛更改名稱，有關研究人員也相應改行，孫中山研究已經不是“顯學”了，因而研究成果也大為減少，兩岸這方面的學術交流也就大為縮減了，以至有些臺灣學者感慨地說，真正研究孫中山思想的還是在大陸。

而在當時，臺灣當局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也就成了以“自由民主統一中國”了。進而在 1998 年，臺灣的國民黨主席和“總統”李登輝則公開喊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新提法，這就完全背離了孫中山思想，也就是不要統一而走向臺灣獨立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在主張“台獨”的陳水扁當政後，還有一點零星的兩岸交流是以孫中山思想研究為主題的，個別臺灣學者在這種學術會議上一再介紹民主選舉的“經驗”和情況，也就很離譜了。孫中山先生的在天之靈，如果真有感覺，對於臺灣直接選舉產生的兩屆“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在政治上的種種所作所為，真不知如何感想了。

#### 四、結語

臺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於 1998 年提出的“中華民國在臺灣”論調，可謂是“理論和實踐上重大突破”，使臺灣政壇上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分裂口號和論調都紛紛出籠，促使了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得以當選執政(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中華民國”已經成為“台獨”分裂勢力的招牌和工具。下臺後的李登輝除去偽裝而成為極端“台獨”努力的總代表，對此仍然感到不夠，還要進一步“臺灣正名”，再來一次“理論和實踐和突破”而催生“臺灣共和國”。

“台獨”勢力的種所作所為，不僅背叛了孫中山思想，也是對中國統一大業的嚴重挑戰和對中國和平統一事業的嚴重損害，必須嚴肅對待。學術界的任務是，必須加強兩岸學術交流與研究，揭穿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分裂勢力的“理論和實踐的突破”的把戲，找到有利於國家和有利於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解決辦法，並使孫中山思想的旗幟重新飄揚在臺灣島內。

(盧曉衡，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4 年 9 月